

谈《鼠疫》的人都在封城之外，就像加缪。对于武汉人，不可能将封城的日子当成一种荒诞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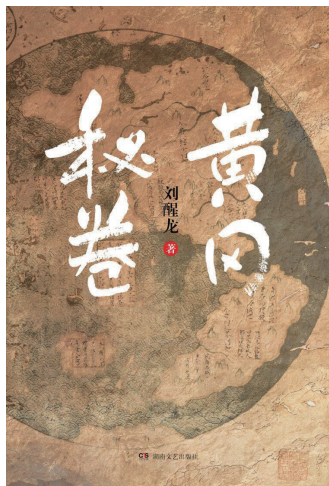
在交稿时，我就想到了，并坦率地告诉对方，武汉封城战疫，与“九八抗洪”太不一样了，很可能出现不了像《为了谁》那样一夜之间唱彻天下的名曲。根本原因在于，封城中人所感受的，与封城之外的感受太不一样了，这从外界对湖北人和武汉人截然不同的表现就可以看出来，千里之外的湖北武汉让他们真切地关爱与关怀，一旦湖北人和武汉人出现在面前，又像是如临大敌。事实上，那一阵子，武汉人的理智中，无论愿意或不愿意，都在做各种“如果”中最坏一层的准备。别人说一声“武汉加油”，武汉人一百次流泪感恩还嫌不够。别人在疯传，武汉三镇周边急调来几支防化部队，武汉人却没有哪一个转发。别人都说来日方长，封城中人只能在来日方长前面加上使人双泪暗流的“如果”。

《新民周刊》：很多人将新冠疫情与加缪的《鼠疫》做比较，在你看来，这两种疫情有什么异同？在封城期间，有没有一种自己成了加缪《鼠疫》的局内人的感觉？在加缪，更多的是荒诞感，加缪本身也没有亲历鼠疫，所以很多都是他的想象，在你的这部散文，则完全是纪实的，从纪实来看虚构，从现实主义来看存在主义，你认为两者是否都真实？

刘醒龙：谈《鼠疫》的人都在封城之外，就像加缪。对于武汉人，

不可能将封城的日子当成一种荒诞。所谓荒诞多数源于道听途说，来源于精神的高高在上，来源于现实中的事不关己，来源于专业上所谓艺术创新。人在隔岸观火时，思想可以很灿烂，也可以是很委琐。在武汉人的精神与肉体的经历中，封城不是一般所说的76个日日夜夜，而是76天里数着一分一秒活下来的刻骨铭心。《如果来日方长》刚刚上市，夫人收到一位朋友的微信：“清明节的两天，我在家一直认真阅读大作，今天清晨读到刘老师求助口罩、防护服的情景时，不禁泪出，只有经历过疫情的武汉人才会一起共鸣。”在城外的人看来，在天大的疫情面前，寄上一只口罩、一只护目镜和一件防护服，太荒诞不经了，对封城中的武汉人，却会感动得泪流满面。大家都在说真实，人生却不相同。

下图：封城期间，刘醒龙在《黄冈秘卷》中用“世上最贵的皮鞋”写过的熊家老表悄然离世，曾经是浪漫爱情缩影的二叔也在次生灾害中走远了。



《新民周刊》：武汉封城期间，你的日常生活是怎么样？你的一位同行说他非常的焦虑，读不进书，除了关心疫情之外，你日常还做些什么？

刘醒龙：封城的那段日子，是自己人生中最本色的时候，既要做好儿子，关心老母亲的状况；又要做好父亲和爷爷，关注孩子们的身心变化；还要做好丈夫，倾听夫人的咳嗽声，何为相同，何为不同。在做好每个角色的同时竭尽全力做好被认定为“高危人群”的自己，不让自己给家人带来不必要的麻烦。从做饭、吸尘，到满世界找消毒用品，到审时度势给家里换换空气，到想办法消灭从马桶中钻出来的老鼠，所有这些平时都不是事的事情，都是家里的大事。

《新民周刊》：你的人生中和小说中已经经历和书写过很多生老病死，这一次的新冠肺炎疫情，再加上你的母亲在疫情期间得了重病，又有什么不同不同的感受？

刘醒龙：封城期间，我在《黄冈秘卷》中用“世上最贵的皮鞋”写过的熊家老表悄然离世，曾经是浪漫爱情缩影的二叔也在次生灾害中走远了。老母亲熬过了疫情，熬过了疫情之后接连三次病危，今年大年初五凌晨在睡梦中含笑大行。这些经历让自己对人生有了不一样的体验，说是不一样，其实也是很普通与很常见的道理：无论我们是如何想、如何做的，这个世界都不可能为某一个人、某一种势力、某一类文明所独有，唯一能做好，也是唯一能够做到天长地久的事情只有两个字：陪伴！这也是《如果来日方长》所要表达的。■